

#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

## 第四章

苏联專家維·米·斯特列里尼科夫講稿  
复旦大学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教研組譯

1957年 上海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Фудан  
кафедра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В. М. Стрельников

Тема IV

меньшевики и большевики в период  
столыпинской реакции. Оформление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ую марксистскую партию (1908—1912 г.)  
лекции, прочитанные аспирантам  
в 1955—56 учебном году

---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  
(第四章)

維·米·斯特列里尼科夫 講稿  
復旦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教研組譯

1957年1月第1版 印数: 1,400

字数: 88,000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 第四章 孟什維克与布尔什維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維克正式形成为独立馬克思政黨。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时期)

### 第一講 斯托雷平的反动。列寧为馬克思政黨理論基礎而斗争。

我們講完了日俄戰爭和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时期，現在我們开始講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礎課程的第四章。

第四章在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礎課程中占有特別的地位，因为这一章是講馬克思列寧主义政黨的理論基礎——辯証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

大家知道，沙皇政府鎮压了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后就开始了艰苦的斯托雷平反动年代。这一章就是要講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維克的斗争。这一章闡明布尔什維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策略，布尔什維克党反对馬克思政黨敌人——取消派、召回派及托洛茨基分子等的斗争，反对那些轉到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陣營里去并企圖修正馬克思政黨理論基礎的党内知識分子的斗争。这一章最后要講到一九一二年布拉格党代表會議，在这个會議上布尔什維克形成为独立的馬克思政黨。因此，这一章从年代上說來包括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布尔什維克党的面前擺着刻不容緩的任务，就是要揭露并徹底粉碎馬克思政黨理論方面的变節分子，捍衛

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政党的理論基礎。这是具有國際意義的任务，決不允許放弃这个任务。而除了布尔什維克之外，也再沒有人能够解决这个任务。

苏联共產党的創始人和領袖列寧在其所著“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中完成了这个具有歷史意义的任务。

列寧的战友斯大林与列寧一起領導反对修正主义者及变節分子的斗争，他在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間發表了他的理論著作“無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書，在这本书中他批判了那些在哲学上的反馬克思主义派別，捍衛了馬克思主义世界觀的基礎。斯大林在其以后的許多著作中，特別是在以后編在“苏联共產党(布)歷史簡明教程”第四章中的“辯証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里，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有的革命理論，根据最新的科学成就与革命实践創造性地進一步發展了辯証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的學說。

关于第四章的內容將分六次來講。

研究第四章，特別是研究列寧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是有些困难的，但是成功將决定于是否能堅毅地、深入地独立鑽研有关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著作。至于更詳細、更深入地闡述辯証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的問題，則在高等学校里的高年級另有專門課程進行講授，而对你們則將在哲学課中講。

第四章第一講的題目是：“斯托雷平的反动。列寧为馬克思主义政党理論基礎而斗争。”

在今天这一講里我將从三方面，即从經濟方面、政治方面与思想方面，來說明斯托雷平的反动，然后再說明有关列寧捍衛和發展辯証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的各个問題。講課的內容即將按照这样的順序來叙述。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頒布了關於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並修改選舉法的沙皇宣言。沙皇制度這次的行動被稱為政變，因為沙皇政府頒布新選舉法違背了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的宣言及國家的根本法，按照這些文件非經杜馬同意任何法律都不能生效。

這個新選舉法使地主和工商業資本家在選舉代表參加杜馬時能占很大優勢，並大大地縮減了工農代表的人數。它保證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復選人占復選人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大地主只占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二，而其復選人却將近占復選人總數的一半，農民的復選人數幾乎被縮減了一半，從原來的百分之四十一減到百分之二十二。工人復選人數從百分之四減為百分之二。各民族邊區的代表人數被縮減得更多。波蘭在第二屆國家杜馬里原有三十七名代表，現在只能選十四名。高加索在第二屆國家杜馬里原有二十五名代表，這次只能選十名。中亞細亞在第二屆國家杜馬里原有二十一名代表，這次完全被剝奪了代表權。代表的總數從五百二十四名減少到四百四十二名。第二屆杜馬中社會民主黨的代表被沙皇政府交付法庭審判，被判處苦役或流放。

六三政變最終確定了反革命勢力對革命力量的暫時勝利，六三政變是最殘酷的反動統治時期的開始，這次反動就以其頭子的名字而在歷史中被稱為斯托雷平的反動。

斯托雷平是地主，並是貴族的領袖，後來做薩拉托夫省的省長，以殘酷鎮壓農民而受到沙皇的賞識，當他領導政府時，農奴主——地主——因被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時期的人民群眾運動所嚇倒，所以正在想給自己尋找新的支柱。按列寧的說法，地主們想“到俄國一般新資產階級成份中，特別是到俄國農村新資產階級成份中去尋找同盟者。斯托雷平企圖把新酒裝進舊瓶里去，把舊的專制制度改造為資產階級的君主制度……”

(“列寧文選”，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730頁。)

六三制度是想要挽救農奴制的君主制度的最后一次嘗試，是重振農奴制君主制度與資產階級的聯盟的嘗試。這個聯盟的基礎是在保障農奴主的優先地位的條件下使農奴主與資產階級分享政治經濟特權。這種聯盟所以有可能建立是因為自由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被人民的運動嚇得要死，所以承認農奴主的領導權並用盡全力支持專制制度想通過適應國內資本主義發展來維持自己地位的各種企圖。

反動的選舉法使得第三屆國家杜馬中黨派的成份有利於沙皇制度，按其成份來說，第三屆國家杜馬是黑幫與立憲民主黨的杜馬。斯托雷平政府時而依靠杜馬中地主的多數，時而依靠資產階級的多數來取得平衡。

斯托雷平主義按其本質來說是要使沙皇制度按拿破崙主義的道路來發展，也就是說周旋於各個階級之間。沙皇君主制度向拿破崙主義方面發展，在國內資產階級發展的形勢下是不可避免的，當時按其淵源及其基礎而言是封建性質的專制制度“為了免於崩潰，不得不求得平衡，為了要統治下去，不得不奉承，為了討人喜歡，不得不收買，為了不單靠刺刀來維持，不得不結交社會殘渣——盜賊、騙子之流”（“列寧全集”，俄文版，第15卷，第245頁。）這樣的統治制度造成了一種幻覺，似乎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的，是“超黨派的”，似乎是不依賴於某一階級的利益的。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能夠保證擺在沙皇政府面前的雙重重任務的完成——既保衛了農奴主——地主的階級利益，同時，又保證國內資產階級的發展。

沙皇政府不得不一方面迎合貴族地主的貪求，另一方面又迎合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貪求。沙皇政府按照保皇派的自由資產階級和黑幫地主的指使，實行了一系列工人立法和土地改革措施。

政府把斯托雷平看成是“俄國的俾斯麥”，俾斯麥用“鐵血政策”鎮壓了革命，並保証了國家的資本主義改造。國家杜馬在斯托雷平面前表現得極端的討好和順从，支持政府的血腥恐怖政策和挑撥離間政策，毫不吝惜地撥款給警察局、憲兵、監獄、地方自治派長官和神職人員。

資本家和沙皇制度緊密地聯合在一起，向工人階級大舉進攻，取銷了工人階級在革命年代里所獲得的一切。

在反動年代里、在因一九〇七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而引起的工業停滯的年代里，工人階級的生活變得特別地困難。失業具有了群眾性。部分失業現象很普遍，工人每周只工作三、四天，甚至二天。工人的物質生活急劇惡化，貧窮和飢餓不斷增加了。

在反動年代里先進的工人和農民遭受到沙皇政府和沙皇制度所組織的黑幫百人團組織的野蠻迫害。

國內到處設立軍事法庭，把大批的革命家判處絞刑。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三年之內有五千人以上被軍事法庭宣判死刑。此外，許多先進工人和農民不經過法庭審訊就被黑幫和討伐隊殘殺了。沙皇政權大批殘殺的政策發展到了厚顏無耻的地步。如有一個區軍事法庭曾作出了這樣的判決：“將被告處以死刑，而物証——鈕扣——則歸還給他的親人”。革命者在監獄遭到殘酷的毒打，拷問和折磨。沙皇制度要想把國家變成為血腥的拷問室。

布尔什維克黨遭受到沙皇制度的最大迫害。沙皇暗探局加緊搜捕當時秘密居住在芬蘭的列寧。沙皇暗探局想要摧殘党和革命的領袖。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列寧冒着極大的生命危險再度亡命國外。著名的黨的工作者屢次被逮捕，因而中斷了他們作為職業革命家的工作。

由於大批的逮捕，當時黨員數量大大的減少。如彼得堡黨

組織在一九〇七年春天，共有七千个黨員，而到一九〇八年年底却減少到三千人。莫斯科黨組織在一九〇七年有七千五百个人，而一九〇八年只剩三千五百人。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國社會民主工党的黨員數字一九〇七年是二千人，到一九〇八年減少到六百人。有几个無產階級成分不大的黨組織則完全解了，其他組織也都大大地被削弱了。

党經受了嚴重的組織危機。但是列寧派布尔什維克頑強繼續進行革命斗争。他們是俄國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他們和孟什維克進行徹底的不調和的斗争，揭露他們是無可救藥的社會主义者，是資產階級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大家知道，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孟什維克就已經滾入妥協主义的泥潭中去，已經變成了工人运动中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在反动时期，他們企圖在人民中間散布憲法幻想，說：“俄國要实行充分民主，除了國會發展的道路以外，沒有別路。”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里，工人的工会团体和文化教育團也遭到了殘酷的迫害。例如对失業工人的帮助就被当作封閉工会的充分理由。在會議上，警察局的代表逐字逐句地吹毛求疵，禁止使用“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罢工”、“工賊”等字眼，理由是這会使人感到有“革命的气息”。在莫斯科印刷業工人协会的會議上，警察長竟事先警告報告人不許他發言，厚顏無耻地对他說：“本來嗎，你是不會稱贊政府的，而要辱罵政府我又不答應，那么最好还是不要講吧。”甚至連那些題目与当前政治事件远不相关的报告也要禁止。例如，在土拉，曾禁止工人团体“教育社”作关于土地和植物起源的演講，理由是“這個問題已經由聖經解決了”。由于警察的迫害，工会會員的数量从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的三十二万五千人，減到了一九〇九年末的一万四千人。

在沙皇政权和資產階級的协同打击下，反动时期的罢工

動大大地低落了。一九〇七年時參加罷工的有七十四萬人，一九〇八年時有十七萬六千人，而到一九〇九年只有六萬六千人。一九一〇年是工人罷工運動最低落的時候，根據官方資料，當時罷工的僅約四萬七千人。

沙皇政府以最殘酷的迫害來鎮壓人民群眾的鬥爭，同時還力圖用它的土地政策來擴大六三君主政體的社會基礎。

沙皇政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決定鞏固富農，以便依靠他們來反對貧苦農民。沙皇制度過去採取的政策是保持農村半封建制度，即村社土地所有制、農民的等級隔閡、份地不能轉讓等等，現在則轉而採取新的政策：即用強力破壞村社，並培植獨家農場和單獨田莊形式的土地私有制。用鼓勵移民和強迫移民的政策代替過去的那种竭力阻止和禁止農民遷移的政策。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發布的法令是沙皇土地法的基礎。這法令破壞了村社的土地使用制。每個農民都可以把自己享有的份地變成自己的私產。農民可以出賣自己的份地，而在以前他們是沒有權利這樣做的。村社必須割給每個退出村社的農民以連成一片的土地（單獨田莊，獨家農場）。

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書中對沙皇制度所實行的土地措施的階級本質作了透徹的分析。列寧指出，斯托雷平土地法“這是第二次為了資本主義的利益而對農民大批施行暴力。這是第二次用地主方式實行資本主義清洗土地”。（列寧：“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73頁。）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首先是对富農有利的，因為富農有足够的耕畜和農具能把房屋和其他建築物轉移到獨家農場。富農向貧農收買土地，擴大自己的土地。貧農退出村社以後，不得不賣自己的土地，有時簡直就被人們從土地上趕走，因為他們沒

有向農民銀行支付到期的款項等等。貧農不但被迫離開村社，而且還被迫離開農村，而處於雇工人員的地位。而沙皇政府還給富農大量貸款，並力圖幫助富農的單獨農莊進行土地整理。沙皇政府為了要幫助地主，以很高的地價向他們收買土地，然後再賣給富農。

沙皇制度的土地政策除了培植獨家農場和單獨田莊之外，還有著另外的目的，即要把農民從中部各省大批移民到烏拉爾以東俄國的內地去，使他們遠離地主的莊園和革命鬥爭的中心。沙皇政府推行移民政策，首先是企圖緩和國內中心地區的農業危機，轉移農民對地主土地的注意，緩和農民和地主的階級矛盾。地主們改變了一句有名的民間諺語說道：“走得更遠一些，就將更安靜一些”。

但是斯托雷平的改革並沒有像沙皇政府所希望的那樣解決土地問題。農村中的階級鬥爭更加尖銳化了，改革相當地加速了農村的分化和無產階級化。

斯托雷平要求有“二十年的安靜”以實現沙皇政府的土地改革，但是國內的階級鬥爭沒有一天停止過，這種安靜也不會有過。

沙皇政府的新土地政策，並沒有觸動俄國農業危機的基礎——地主土地所有制，因而也就沒消除農民運動發展和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

斯托雷平的“土地搗亂”（農民是這樣稱呼強迫解散村社的行為的）沒有解決對農業進行資本主義改造的任務，却使農村的階級矛盾極端尖銳化並更形擴大。與沙皇政府的打算相反，土地改革為鞏固工農在推翻沙皇專制制度鬥爭中的革命聯盟提供更充分的客觀前提。

不僅在政治和經濟方面，而且在思想戰線上也展开了反革命的進攻。

反动的進攻使得不堅定的小資產階級分子脫離了革命，引起了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等小資產階級政党的分崩离析。工人階級和農民运动的失敗在一些革命的同路人中間引起了瓦解和腐化，這些同路人靠攏工人运动是指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能迅速成功，他們在反动时期不能坚持。其中有一部分人跑進了反革命的陣營，另一部分人則盤踞在合法的工人組織中，極力想破坏無產階級革命政党的威信，引誘無產階級离开革命道路。

知識分子中間的瓦解和腐化特別厉害。在革命最高漲的时期中从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方面參加到各革命政黨中來的知識分子，当高潮过去的时候，当革命的好日子过去了而斯托雷平反动的艰难时期來到的时候，当每一个革命参加者对革命的忠誠受到嚴重考驗的时候，許多人都脫離了这些政党。許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不願冒繼續進行斗争的危險，寧願采取適應斯托雷平制度的政策，寧願脫離革命。对其中許多人說來，脫離革命意味着直接的背叛，轉變到敌人方面去，而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極力想通过报刊來影响無產階級，想說服無產階級取消革命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而去適應并“長入”到斯托雷平君主制度。

在科学、文学、繪画、音乐等部門中都表現出了帶有各种唯心主义色彩的反动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影响。1909年資產階級思想家司德盧威、貝爾爵也夫、布尔加可夫等人所出版的著名的“路标”文集，是这些年代中反革命在思想战線上進攻的一个鮮明的表現。这一帮立憲民主党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公开宣布他們認為最可怕的是人民，而只有專制制度才能用刺刀和監獄把他們从人民那里拯救出來。

列寧把“路标”文集称为自由主义的背叛行为，可耻地背弃革命，向沙皇制度搖尾乞憐，向外國資本卑躬屈膝的思想宣言。路标派在自己的反愛國主义的和世界主义的文章中污辱了革命

民主主义者优秀代表人物的偉大傳統。

“路标”文集的作者們捍衛唯心主义，承認精神生活对社会存在的第一性：他們硬說，知識分子所主要关心的不應該是政治和其他一切社会生活，而應該是“个人的內部精神生活”。兩性关系、家庭問題等。路标派是資本主义制度的捍衛者，所以他們要求劳动群众脱离階級斗争，而進入神秘的追求和道德上“自我提高”的世界。

这一时期頽廢主义和神秘主义在資產階級一貴族文学中表現得最为明顯。为什么頽廢主义在文学中表現得最为明顯，这是不难了解的。高尔基指出：“文学是社会諸階級和集团底意志形态——感情、意見、企圖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現。它是階級关系最敏感的最忠实的反映。”（高尔基：“俄國文学史”，新文藝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頁。）

資產階級一貴族文学为自己所提出的基本任务，是要使劳动群众厭惡政治、厭惡革命。当时一切頽廢文学的基本口号無非是要“証明”：不值得同命运去作斗争，同命运去作对，因为这几乎反正是沒有用的。人是沒有出路的；他無論怎样努力也不能影响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他沒有任何前途。一切都是沒有价值的，人是下賤的。生活是骯髒的污水塘，誰都不免要淹死在里面，不管他怎样努力地想爬出來，不管他怎样地求救。誰也救不了誰，就像人自己救不了自己一样。

在反动文学家（米利什涅夫斯基、基比烏斯、阿支巴綏夫、沙洛古勃等）的書本中，百般嘲笑俄國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宣傳反社会的，公开地敌視人民和民主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他們千方百計辱罵革命，贊美叛变行为、挑撥离間和利己主义、鼓吹淫乱等等。萊奧尼特·昂特列也夫的許多作品完全是对革命者的嘲笑。高尔基宣称：“人——这是个驕傲的称号！”但是对政治斗争失望而要使革命者到妓女那里去悔过的萊奧尼特·昂

特列也夫却在作品中鼓吹“人是‘深淵’、‘謊言’、‘瘋狂和災禍’”。在“黑暗”这一部著作中，主角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他摈弃了一切他以前为其服务的东西。他說道：“要是我們的燈籠不能把一切黑暗都照亮的話，那末就讓我們把火熄了，一起爬進黑暗中去吧。”昂特列也夫就这样否定了革命功績的可能性，而这一否定，特別在革命遭到失敗以后的时期，具有非常反动的意义。在另一个短篇小說“猶大·依斯卡利奧特”中，昂特列也夫把这个叛徒描寫得很为吸引人，就这样來為在反动时期盛行一时的奸細行为進行精神上的辯护。1907年出版了阿支巴綏夫轟動一时的小說“沙寧”。在这部小說中描繪了一个無原則的知識分子、明目張胆的革命敌人，他否定一切社会理想，宣揚利己主义、动物本能、寄生式的生活享受。阿支巴綏夫用他的主角的嘴說出这样令人作惡的話：“人天生就是卑鄙的。”

米利什涅夫斯基的著作具有最为反动和神秘的性質。他在一篇論文中談到对專制制度采取“牺牲态度”时寫道：“为了使熊不來碰你，就得躺在地上裝死——不呼吸、不移动；熊到处聞一聞就走开了。对当局亦要如此：要對他們順服，要順从到像死去的地步，要順从到感到自己已經死去——就像死人头戴花冠躺在棺材里一样。这时候当局就不再可怕，就会解除武裝，而我們將透过其禽獸般的面貌而看到基督的面貌。”

这些变節作家們的小說，像印几百万册的美國偵探小說一样，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間很为流行，它們以無思想性、非政治傾向和頹廢情緒來毒害这些知識分子的意識。这一类文学的坏影响可以由自殺的統計來証明，当时自殺的次数大大地增加。

由于脱离人民的生活、局限于个人感受的狭窄圈子，使得頹廢分子趋向資產階級客觀主义和世界主义。宗教也是反动派同革命進行斗争时的有力武器，这一点在“尋神論”和“造神論”的

宣傳中得到了反映。

頹廢主义和对革命失却信心也影响到某些社会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們虽然自命为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上却从来也没有穩穩地站在馬克思主义的立場上。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宣傳馬赫主义，把它作为哲学中“新的”的流派，并且他們还在“捍衛”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修正辯証唯物主义和歷史唯物主义的基礎，从而使自己参加到反对革命、反对無產階級政党反动的总進軍中去。

这是一种侮辱和破坏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理論基礎的企圖。1908年出版了几本俄國馬赫主义者的書籍。这些書是公开反对辯証唯物主义和歷史唯物主义的。宣告了对馬克思主义哲学基礎的進軍。俄國的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諾夫、巴查罗夫、尤史克維奇、瓦連廷諾夫、貝爾曼、盧那察爾斯基等——在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并没有为自己創造什么新的理論武器；他們只利用了反动資產階級的旧武器。这些人是卑鄙地、兩面派地、不誠懸地、叛賣性地進行批評的。这是一种懦怯的、躲躲藏藏的对馬克思主义的背弃，时常以似乎是出于一种“实际的考慮”來为自己辩护，大部分都通过这样的办法來進行，即胆怯地、非系統地嘗試抛弃“旧的”馬克思主义和代之以“新的”資產階級學說。（参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17卷，第355—356頁。）

这种黑暗势力的思想基礎是馬赫主义哲学，是經驗批判主义（也即是“批判的經驗”的哲学——这是一种在十九世紀后半叶產生于德國和奧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派別）。这一派哲学的創始人是阿万那留斯和馬赫。他們断言道，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主体的感觉、是个人的感觉、是“我”。因为“我”感觉到事物，所以事物才存在。它們（外界的事物）是我的感覺的綜合。

这一切進軍的目的是要引誘群众离开革命，破坏共產主义

的理論基礎，推翻馬克思主義。

無論如何必須要徹底扑滅这种思想上的歪風，揭露他們的主觀唯心主义的本質，捍衛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礎而使它不受到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的侵襲，并以辯証唯物主义的理論來武裝党。

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列寧。普列漢諾夫采取調和主义的态度。列寧在致高爾基的信中指出：“普列漢諾夫在本質上完全是反對他們的，只不过他不善于，或不願意或懒得把这点具体地、詳細地、簡單地而不用哲学的微妙性來恐嚇公众这样地說出來。而我無論如何要以自己的方式說出这点來。”

列寧的名著“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完成了揭露和粉碎經驗批判主义，以及發展辯証唯物主义哲学的任务。這本書在1908年寫成，在1909年出版。列寧寫這本書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略論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本馬赫主义文集的出版。列寧指出，這本書正確的稱呼應該是反對馬克思主义哲学。

于是列寧着手从事揭露馬赫主义哲学的工作。列寧進行了巨大的科学工作，研究了許多書籍，研究了現代自然科学、物理学。他是全付武裝地來批判馬赫主义的。

列寧的“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經典著作。列寧不單捍衛了辯証唯物主义和歷史唯物主义，使其不受修正主义者的侵襲，而且还把它加以進一步的發展，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死后的革命斗争經驗和科学發展所提供的一切新的东西進行了概括。这一本書有助于揭露一切政治上的和理論上的修正主义者并把他們从自己的隊伍中赶出去。列寧同时以此为布尔什維主义在一九一二年布拉格代表會議上形成为独立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为新型的政党，作了准备。

列寧的著作將始終是汲取智慧的泉源，是从哲学上來丰富人类思想的泉源。列寧把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了更高的階段。

列寧在其所著“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中全面地批判了經驗批判主义。他不僅揭露了俄國馬赫主义的深刻的思想根源，而且也揭露了經驗批判主义从創始人——馬赫和阿万那留斯的思想根源。列寧分析了馬赫主义哲学的社会階級根源，思想根源及反动本質。列寧指出，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巴查羅夫、尤史克維奇、瓦連廷諾夫、伯尔曼等俄國馬赫主义者沒有提出任何新的哲学，而是恢复了主觀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只是对它貼上了新的标籤而已。这是想使貝克萊、休謨、康德等早已死去的学說复活的一种嘗試。

列寧寫道：“‘最新的’馬赫主义者所提出來的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論据，沒有一个，真正是沒有一个不是貝克萊主教所已經提出过的。”（列寧：“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頁。）

馬赫主义哲学是帝國主义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一种精巧形式，它的思想根源是反动階級的唯心主义哲学，首先是英國主教貝克萊的主觀唯心主义。

列寧在批判馬赫主义时首先就揭露馬赫主义的歷史根源，指出馬赫与阿万那留斯与俄國馬赫主义者并不是首創的思想家，他們的哲学完全不是新的，而至少有二百年以上的歷史。他們的老师是十八世紀的主觀唯心主义者貝克萊和不可知論者休謨与康德。馬赫主义者并沒有对他們的学說补充一个新字，他們只不过企圖用新的術語把陈旧的唯心主义的廢物裝璜一番，用各式各样的字眼來点綴一下，以掩飾自己的唯心主义，掩飾反对唯物主义的斗争。

列寧在“代緒論——若干‘馬克思主义者’在一九〇八年以及若干唯心主义者在一七一〇年是怎样駁斥唯物主义的”这一段中指出：俄國的修正主义者日益从事于推翻唯物主义。他們所用的論据，就是貝克萊主教的論据。他們說，唯物主义者承認

某种不可思議的“物自體”，“在經驗之外”、在我們認識之外的物質。而他們這些唯物主義者就由此陷入了神秘主義，使神話倍增，宣傳“二元主義”並承認我們意識之外的物的存在。

貝克萊這個主觀唯心主義的典型代表（這種主觀唯心論是以感覺主義為基礎，也即使以承認我們的感覺是認識的唯一源泉為基礎的），也曾說過同樣的話。貝克萊曾說：除了感覺、思想和意識，什麼都不存在，物對象是感覺的綜合，是“我”的觀念的綜合，按照貝克萊說來，除了主體的知覺和感覺以外世界是不存在的。

“當我說我寫字的桌子存在着，這就是說，我看見而且感覺着它；如果我不在自己的書房里，那我說它存在着，意思是說如果我在自己的書房里，我可以感覺到它。”（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頁。）

貝克萊說：我完全不能理解，怎樣可以不提及某人感知物而說物底絕對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

貝克萊斷然否認我們的意識和思惟以外的物的存在，認為關於“物質或物体實體”是存在着的思想，是“矛盾的”，是“荒謬的”。按貝克萊說來，客體不存在於心之外，客體是感覺，是感覺的綜合。貝克萊說，物質是虛無，是不存在的實質。馬赫主義者所宣傳的就是這些哲學原理，把承認“物自體”稱為是對唯物主義的歪曲，是染上了康德主義，這同時就表明了他們在基本的哲學派別的歷史上是愚昧無知的。貝克萊在一八一〇年（即在伊曼努爾·康德生前十四年）就已經寫過：客體是感覺的組合，心以外的客體是不存在的。

為了要理解馬赫主義者的哲學，讓我們再繼續聽一听貝克萊的話。

“如果你覺得非如此不可——貝克萊嘲笑唯物論者道，那末你們可以在別人使用‘虛無’這個字眼的意思上使用‘物質’這個字